

配合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盘龙城遗址博物院重磅打造的《寻绎夏商》特展，眼下正在热展。  
特展汇集全国35家文博单位的163件(套)精品文物。展品跨越多地、品类丰富，从一众明星文物到不太起眼的陶甬，串联起夏商王朝四方交融的文明图景，为公众呈上一场文化盛宴。

### 四方瑰宝集体“出差” 讲述夏商文明故事

展览汇聚中国国家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博物院、三星堆博物馆等国内顶级文博机构的馆藏，涉及甘肃、河南、山西、四川、辽宁、内蒙古等多地。夏商精品文物集体来鄂“出差”，不少文物更是首次外借、限时展出。

河南博物院藏铅质建筑装饰构件，造型独特，纹饰精美，为商代王室专属的“高定”。商人大小事都会占卜，天津博物馆藏不雨卜骨，记录了商王对“是否不会下雨”的虔诚占卜，此次为卜骨首次出馆展出。三星堆遗址与石家河、盘龙城遗址有着密切关系，三星堆文物多次来湖北“走亲戚”。此次展出的三星堆博物馆藏青铜人面具，夸张的造型引人注目，观众们对其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更为着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亚长”觥，造型生动，近流处饰一大一小两头象纹，这种“大象带小象”的构图在商代青铜器中极为罕见。铭文中的这位亚长将军，是商王武丁时期战死沙场的铁血战将，地位仅次于赫赫有名的妇好。山西博物院藏兽面纹簠，器身满饰“三层花”纹饰——云雷纹衬底，凸起兽面主

### “考古之最”集中登场 刷新夏商文明认知

展览汇集一批近年来创下考古纪录的“之最”级文物，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延续至商代中期，从文字、建筑、青铜、礼乐等多个维度，刷新对夏商文明的固有认知。

其中，山东五村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陶鼓，是迄今所见较早的打击乐器，以泥质红陶烧制，搭配兽皮鼓面，底部预留音孔，溯源中华礼乐文化的最初形态。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丁公陶文是一级文物，陶盆残片上留存5行11字，刻字笔画流畅，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成句文字。

陕西芦山峁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的陶瓦，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陶瓦实物之一，打破“陶瓦始于西周”的传统观点，重塑上古建筑发展脉络。

多项发现改写了夏商时期既往考古定论。其中，夏代晚期网格纹铜鼎，出土于河南二里头遗址，是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鼎，有“华夏第一鼎”之称，是王权礼制萌生的象征，为探索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物证。同期亮相的二里头铜甬，是夏代稀少的青铜容器，是当时贵族专属器物。

### 南土重镇盘龙城 见证南北深度交融

考古学家、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接受采访时表示：“盘龙城是首次从考古角度证实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文明摇篮的遗址，实证夏商时期中央与地方已形成成熟的互动格局。”

展览以实物为证，清晰展现盘龙城强大的辐射力，实证三千多年前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文明互通互融的历史实景。

其中，盘龙城遗址李家嘴二号墓出土的青铜钺，是商代早期目前发现的出土体量最大的青铜钺，象征着区域最高军事统治权。

盘龙城杨家湾17号墓出土的绿松石镶嵌金饰件，是国内现存年代最早的绿松石镶嵌制品，经考古工作者复原后，完整呈现出一对双身的浮雕龙形态。铜带螭形器兼具觚、罍、角等青铜器器的部分特征，左右对称，富有美感，被认为是本地特有的创新器型。盘龙城出土的这批高规格绿松石器、青铜礼器等，充分印证其作为商朝南土中心城邑的枢纽作用，是南北物资流转、技艺互通的核心节点。

依托稳固的军政地位，盘龙城形成广阔

### 鄂东工匠北上殷墟 融入早期中国“移民城市”

展品中，有一件不太起眼的陶甬，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北徐家桥墓地，形制却与商代鄂东地区的陶甬近似。该墓地是石匠家族墓地，表明鄂东地区的匠人来到都城加入制石手工业生产中。

“鄂东南工匠北上制器，生动再现夏商时期人口迁徙、技术互通，鲜活诠释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发展特质。”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策展人宋若虹介绍，展览依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揭开了夏商中心都邑作为中国早期“移民城市”的历史面纱——夏商时期的中心都邑，并非封闭的王权中心，而是四方族群技术、人

员汇聚交融之地。根据同位素分析，二里头作为当时东亚规模最大的都邑，可能有三成的外来人口。根据体质人类学和陶器类型学分析，晚商都城殷墟更是汇聚了八方人口。河南东南部、长江流域、晋陕高原、山东半岛、北方草原地带等族群在此聚居，成为上古中国族群融合的典范。

在南北文明交融中，来自长江流域的手工业匠人扮演着独特的角色。不止鄂东地区风格的陶器，殷墟出土的印文硬陶、原始瓷等器物，也带有鲜明的长江流域手作风格。

夏商王朝的崛起，同样离不开对四方资源与文化的深度整合。牙璋和陶鬯丰富了礼器的组合，小麦和绵羊

充实了物产的结构，铜矿、锡矿、池盐等资源不断输入，龟甲保障了占卜活动的持续开展，马和马车改变了战争形态与交通方式……四方物产与技术专长，在王朝的统一调度下汇聚融合，共同支撑起夏商王朝的繁荣。

一件件跨越山海的文物，串联起绵延不绝的中华文脉。夏商形成的礼乐制度、都城中轴线格局、成熟文字体系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来自山西文博会的李先生感慨：“漫步展厅便能感受到，历史从未走远，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参与今天的构建。”(据《湖北日报》)



商陶甬。



商兽面纹铅质建筑构件。



商不雨卜骨。

▼新石器时代陶鼓。



# 一只陶甬看夏商



商绿松石镶嵌金饰件。

## 西汉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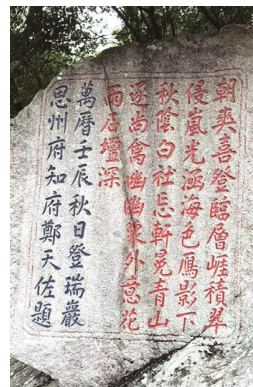
西汉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长58.1厘米，宽20.4厘米，高34.1厘米，重13.34千克，呈犀牛形。犀牛昂首伫立，身体肥硕，四腿短粗，肌肉发达，比例准确，体态雄健，皮厚而多皱，两角尖锐，双眼镶嵌黑色料珠，为古代生息在中国的苏门犀的形象，器物纹样勾勒南方热带风物，承载着先民对南国天地的想象。(据《中国文化报》)

## 清代白玉笔筒



该白玉笔筒高13.6厘米，外壁雕刻梅花、竹枝、仙鹿等喜庆祥瑞的贺寿图案，布局周密，层次清晰。据收藏方介绍，笔筒是古代较为常见的文房用具之一。该笔筒不仅具有实用性，也具有一定的装饰性，颇具文玩价值。(据《侨乡科技报》)

## 明代石刻为知府郑天佐撰书



该石刻位于福建省福州市瑞岩山，镌刻竖排楷书诗作一首，其释文为“朝爽喜登临，层崖积翠侵。岚光涵海色，雁影下秋阴。白社忘轩冕，青山逐尚禽。幽幽象外意，花雨石坛深。”并有纪年题款“万历壬辰秋，登瑞岩，思州府知府郑天佐题。”

据介绍，该石刻为明代知府郑天佐撰书。郑天佐，字时才，号金峰。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郑天佐任湖南桃源县令，后相继担任广东惠州通判、贵州思州知府等职。由“万历壬辰”可知，此石刻镌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据《侨乡科技报》)

## 商青铜神树



铜树底座呈穹窿形，其下为圆形座圈，底座由三面弧边三角状镂空虚块面构成，三面间以内势的三足相连属，构拟出三山相连的“神山”意象，座上铸饰象征太阳的云气纹。学术界认为，这株铜神树的造型与内涵应与《山海经》中记载的“建木”相关，铜树是古蜀人沟通人神、上下天地的天梯，花果神鸟复刻川蜀繁茂山林，藏着古人对秘境的自然。(据《中国文化报》)

# 一只松纹笔筒，记录一段投身理想之路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库房里，静静躺着一只竹笔筒。宽口，平底，高16.6厘米，筒身雕着松竹梅、十八罗汉与一帆风顺船纹。“尔琢自用”——四字深镌，刻痕已模糊。这是目前井冈山馆藏中唯一一件王尔琢本人留存、带有亲笔题字的实物，也是该馆近5年文物征集集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件。

1924年，21岁的湖南石门青年王尔琢考入黄埔一期，同窗有陈赓、徐向前等。在周恩来、聂荣臻引领下秘密入党后，他将个人命运投进了民族解放的洪流。这只笔筒，是他从老家带来的。筒身松竹梅是君子的意象，一帆风顺是长辈对游子的祝福。他刻下自己的名字，带着它去了长沙、武汉、广州。

在井冈山，战士们叫他“飞兵团长”——用兵快，打得很。1928年8月25日，叛徒袁崇全裹胁部队叛逃。王尔琢带一个警卫排疾追60里，在思顺墟孤身入营，高喊：“不要打了，我是王尔琢，是接大家回去的！”叛徒从暗处开枪，他25岁的生命定格在血色黎明。毛泽东挥笔写下挽联：“留却重任谁承受？”这是一个战友对另一个战友的痛惜。

笔筒一度不知去向。1980年被王尔琢的同族后人王盛闻发现后悉心收藏。2025年，老人将笔筒无偿捐赠。移交那天，他手颤得厉害。半年后，老人病逝。

一件小小竹器，观众能从中看到什么？筒身上的松竹梅，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定力。王尔琢出身富足之家，本可走安稳的路，却偏偏选了最艰险的航道。那份定力，刻在竹木纹理间，百年未移。那艘一帆风顺的船，是“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航程。他蓄须明志“革命不成功不剃须”，从黄埔到井冈山，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而笔筒从书斋到战场、从乡野到博物馆的百年辗转，是“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生动注脚。这些年，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用这样的文物，做活了一堂堂课。讲廉政，不讲大道理，就把王尔琢的选择摆出来——富家子弟，放着好日子不过，偏要钻山沟、睡稻草，最后把命搭进去。有一期廉政课上，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展示了这只笔筒的照片，讲了他“不为钱、不怕死、为主义而牺牲”的准则。课后一名年轻干部在心得里写：“它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干净。”

讲统战，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拿出王尔琢在黄埔的史料——那些热血青年，出身不同、性情各异，却在党的引领下走到了一起，成为井冈山上的铁肩膀。一名参加过培训的党外人士说：“那时候的年轻人能走到一起，靠的是理想。今天也一样。”

2027年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100周年，这只笔筒将正式与观众见面，与袁文才、王佐、张子清等烈士遗物并肩陈列。

(据《人民日报》)